



刘力生



不计较个人得失

1957年，解放军胸科医院（阜外医院前身）建院的第二年，刘力生来到了这里，从此与阜外结下了一生不解的情缘。

过去，我国学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国际。刘力生和同道的工作则改变了这一现状。她也用事实说明，中国在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上，有着自己的优势；通过临床试验与国际接轨，中国人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刘力生认为，无论哪个领域，成才之道都无捷径可走。如果说她曾取得某些成功，那也主要是由于有良好的教育和前辈的指引。

“个人勤奋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尤其重要的是要以事业，而不是以个人得失为人生目的。”刘力生说。

协和

刘力生走上从医之路，似乎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父亲是老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生，家中的七兄妹中多有从医者。孩提时代的刘力生和小伙伴们玩耍时，最喜欢的就是给人“开方子”，她也因此得了一个小“小大夫”的头衔。

1930年，两岁的刘力生随父母迁往南京。在家开设了私人诊所的父亲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给穷人看病不收钱。她父亲从不在意个人钱财，他常常告诫子女，待人要宽厚。

刘力生于1949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的体检课是邓家栋教授教的，他说医生应当有鹰一样锐利的目光，能够捕捉到细微的体征。实习医师必须进行全面体检，包括肛门指检。

刘力生班上的一位同学恰是用这种看似多余的指检，曾发现了一位患者的早期直肠癌，使他早期得到根治，并40年后仍健在。

刘力生很喜欢临床，也非常喜欢参加当时由张孝骞主任和朱贵卿、张学德、文士域、张安等研究室主任参加的联合查房。她说，他们以对患者十分负责的精神，分析讨论诊断和治疗问题，许多知识和宝贵经验是书本里找不到的。

收治每个患者，对刘力生来说都是一张新考



刘力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解剖课上

卷。临床工作确实很累，刘力生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锤炼中成长和成熟起来。

她愿意多收患者，多做化验，也爱在节假日替别人值班，借此机会去熟悉其他患者，从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和经验。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度过的3年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生活是24小时负责制。“紧张充实，自己也感到一种愉快和满足。”刘力生说。

启蒙

虽然刘力生记不清非常确切的数字，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协和医院，吴英恺领导的胸外科床位不足15张，学科发展的空间受到了限制。

于是，吴英恺在1956年带了一批人，来到北京西郊的黑山扈，组建解放军胸科医院。

刘力生正式来到解放军胸科医院是在1957年。她跟随朱贵卿教授，打算开展胸内科的相关工作。在刘力生的印象中，朱贵卿讲课讲得好，大家都爱听他的查房，非常生动。“他非常强调查体、物理检查。不能只看数据，不看患者。”

刘力生被分配到解放军胸科医院后，当她和往常一样，穿上白大衣去早查房时，病床上竟是空荡荡的，患者都上后山玩去了。

刘力生顿时大失所望，她想难怪说结核病是“三药两气”没搞头。工作比北京协和医院轻松多了。

朱贵卿主任很器重刘力生，安排她到细菌室和生化科学习，指引她走临床科研的道路。

刘力生表示，或许正是因为她在毕业以后很快就得到朱贵卿主任及其后的黄宛主任的指点，才使她懂得了搞临床不只是经验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勤于思考，发现问题，与研究相结合。”而且，“开展临床研究，才能使道



1971 年与吴英恺院长（右 1）接待美国心脏病专家 Paul de White（前排左五）和 G.E. Dimond（前排右 2）教授

路越走越宽阔。”

刘力生说：“朱贵卿主任给予我这样一种思想：作为一名医生，不是只会看病就够了，一定还要在某些方面有所钻研。”

刘力生开始接触一些相关的科研工作，例如如何从痰涂片检查中早期发现肺癌。

“有时肺结核与肺癌从 X 线片中很难鉴别。不过在那个时候，得了肺癌基本没什么办法，我与朱贵卿教授做过一个 100 例肺癌的病例分析研究。朱贵卿教授会在过程中教你如何总结工作、如何从临床工作中获得提高。”刘力生回忆。

黄宛主任也启发刘力生走临床科研的道路。他说临床好像一座矿，临床工作者好比去探采矿一样，从临床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就有可能通过进一步研究总结出新的规律，关键是你是否用心去观察和发现问题。

黄宛还鼓励刘力生多争取讲课的机会，他说：“只有自己彻底懂了才能

让别人听明白。收获最大的是讲课人自己。”

结缘

1958年，解放军胸科医院转归地方，迁到市区，这就是现在的阜外医院，医生也都脱下了军装，这也成为刘力生与高血压乃至心血管领域结缘的重要转折。

在响应当时“西学中用”的号召下，刘力生学习了1年半的中医。

刘力生回忆道，准确地说，我国的高血压防治工作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1959年，经对全国11个省市的高血压数据分析，发现全国高血压患病率高达5.5%。

“党委书记带着大家一起下去查血压。那个时候还真是很来劲。”刘力生回忆。

从1958年起，刘力生和大家一起，利用周末时间，去给职工和学生量血压，并一个一个记录下来。回忆起这些“苦差事”，刘力生却是一脸的愉悦。这一次，他们调查了16万北京市民的血压情况。

锻炼

1964年，刘力生已经是主治医师，她随医疗队来到湖北北部的大别山。

下基层在刘力生看来却是一次意义非凡的体验：“如果不来到这里，永远不会知道基层是什么样子，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是难得的锻炼。”

“那一年正好赶上流行性脑膜炎。那里的人真是苦极了，尤其是孩子。冬天没有一件像样的棉衣，里面连内衣也没有。棉袄上沾满了饭渣、鼻涕，天气寒冷，棉袄上形成了一层硬壳。有时，父母早上下地干活，回来后发现孩子已经死了。”刘力生回忆道。

在医疗队，刘力生和同事们主要开展巡回医疗，简单地说，就是什么都干。

“我遇到过一个急性胃穿孔的病例。我在给患者听诊，旁边就是驴子拉磨“嘎啦嘎啦”的声音。当时已经根本听不到肠鸣音了，患者的肚子硬得像木板。于是我们赶快招呼老乡卸门板，将患者抬到外科手术点。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把他救活了。要不是医疗队在，这个患者肯定没了。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对我们都非常热情，老远看见我们就喊‘高医生’（高明的医生）。”

“下乡的经历坚定了我对流行病防治的决心。又因为我正在从事高血压的防治工作，方向也就这么定了下来。”刘力生说。

没过多久，“文革”开始了，刘力生也回到了北京。

首钢

“我们开始真正意义上在社区里开展高血压防治是在1969年，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刘力生回忆。

由于要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刘力生作为小队长，带领12个人的协作组进驻首钢。

大家在首钢下属的炼铁厂、炼钢厂、焦化厂、机械厂、发电厂、白云石车间等10余个厂开展调查，帮助那里的工人量血压等。

这个小队通过1年的工作，共给1万多名工人量了血压。结果令人吃惊，首钢工人中，有高血压的人竟然达到了11.7%。

有了这第一手的资料，1972年，专家组成心血管病防治组，对高血压工人建立三级防治网，进行分级管理。

经过10年的跟踪随访，60.8%的高血压工人都得到了管理。服药的人中，71%的人的血压降下来了。

后来，由于一些原因，很多下放到基层的工作队陆续撤离。首钢的工人



80年代初期，Stamler教授等去首钢查现场调查时，当场用Y型管听诊器亲自核对吴锡桂与刘力生血压测量结果是否合格

非常不希望像刘力生这样的专家离开。

有一位张师傅让刘力生印象甚为深刻。

张师傅是全国劳模，舒张压已经到了140 mmHg，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这种精神确实令人鼓舞。

于是刘力生承诺，要留下一只带不走的医疗队。人员虽然有去有回，但医疗队始终在那里。

1982年，刘力生在世界卫生组织“轻型高血压会议”上报告了首钢高血压管理5年和10年随访结果。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考察后，认为首钢的管理模式是“从生到死”，很有借鉴意义，为流行病学研究和高血压管理提供了范例，大医院与基层医疗配合，对高血压的管理效果显著。

“我们现在认为，最适合的方法还是在社区开展慢性病的防治工作，通过提高社区服务站的治疗能力、宣传能力，将高血压的患者在基层管起来，否则有再多的‘协和医院’也于事无补。”刘力生谈到。

刘力生不喜欢悲观消极或怨天尤人，她认为人生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任何环境下即使是逆境都要尽力做些有益的事，学些有用的知识。

刘力生也没有想到万名钢铁工人的防治成为了我国第一个高血压防治点。1982年，由于在首钢的工作受到了好评，她也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轻型高血压

会议上被接纳为国际高血压学会的会员。

留学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有支持中国医生出国学习的名额。经过选拔考试，刘力生获得了前往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大学进修学习的机会。

到了美国，Dustan教授对刘力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到了美国，可以学习美国有用的东西，同时也会看到中国有许多优势，值得美国向中国学习。

刘力生在美国也看到，中国确实有许多优势和潜力。

与此同时，阜外医院开始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建立了合作，即“中美合作项目”。

在20年的中美合作项目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流行病学方面的专业人员。现在活跃在该领域的张新华、武阳丰、吴兆苏、姚崇华、顾东风等专家，都是那个时候一批一批送出去学习的。

“这个项目没有任何经济效益，收获的却是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这应该就是吴英恺教授的高明之处，”刘力生感慨。

1981年，刘力生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引进动物模型和建立动物实验室。在阜外医院生化科张英珊、丁金凤教授的热情帮助下，使得工作进展顺利，并培养了多名硕士、博士



1980年，刘力生在美国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高血压研究所

研究生。

刘力生原计划这些学生出国回来之后可以很快提高我国实验研究的水平，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实验室创建后又渐渐荒废。毕业的学生每年总有一两名，可是出国的学生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刘力生不免从信任和期待中变为失望和恼怒，并谴责他们不知以天下为己任。然而，她也理解学生们也有他们各自的种种理由和处境，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要实现科学上的抱负，就需要良好的信息条件、实验条件和指导教授、需要到国际上去拼搏……想至此，她又感到释然了。

她想，科研本身就是跨越国界的，应该让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有更宽阔的国际大视野。如果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为他们的回归也创造一点条件，总会有几个人最终要回国来发展事业的。

经刘力生送到国外学习的人也很多，并且遍布世界各地。“我们这些被送出去学习的几乎涵盖了医学研究领域各个专业，有高血压临床工作的、有实验室的、有药物研究的、有专门研究数学模型的，还有专门做人群研究的”。

“被送出去的，基本上已经快能组成一家专科医院了。”世界高血压联盟秘书长张新华说。

另外，刘力生也认为，国内的政策有时也需要反思。选拔人才应该有选拔人才的标准。“这不仅涉及优秀学生的前途，更关系到学科、国家发展的前途。”

机遇

刘力生很喜欢和青年人交朋友，他们朝气蓬勃，敢想敢干。

记得在高血压试验研究举步维艰之时，几个研究生为了学科的发展曾多次动员刘力生组织临床试验。

当时她顾虑重重，她说，没有这些年轻人的鼓动我是绝不敢迈这一步

的。国际上每个有关高血压的试验经费是以数百万美元甚至上亿英镑计算，我们如何能做得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又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潜力，有现成的医疗网点和不少人群防治基地，也许这正是一个应该抓住的机遇！

刘力生经过反复思考并得到何观清、高润泉、龚兰生教授的支持，终于在“七五”投标时争取到一个临床试验课题。为了当好牵头人，她把方案寄给国际同行评议。

后来欧洲又主动邀请刘力生与欧洲十一国协作，搞老年收缩期高血压研究。从这时起的7年中，协作组二十几个单位，就在人力物力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凭一股热情和苦干完成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高血压临床试验。

后来，刘力生又克服种种困难，组织进行了 Syst-China, CCS-1, PATs, FEVER, CHIEF 和 CHINOM 等一系列中国独立或合作设计和完成的研究。

“想在指南上说一句话，需要做相当多、相当久的工作。”刘力生说。在收获研究成果的背后，往往历经了重重的阻力和困难。在国内，开展临床研究“先要经历必要的手续，再到处筹集经费，组建研究协作组，并要与患者及家属多次耐心地沟通。

刘力生说：“如果不克服这些困难，就得不到我们自己的证据，那么在国际上就永远没有发言权。”

刘力生更是带领国内学者参加多项国际合作研究，如 HOT, PURE, ONTARGET, INTERHEART 等多项研究，也包括近期公布的 HOPE-3 研究。结果是几乎所有国际大型人群研究都包含中国人的数据，而中国人也能享受这些研究的成果。

在刘力生担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期间，中国加入了世界高血压联盟。2007年，她当选为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并在2009年获得连任。这是中国人在医学专业组织中担任的最高职位。

前任美国心脏协会（AHA）主席 Suzanne Oparil 教授说：刘力生在高血压



2012 年刘力生荣获 ISH 颁发的罗伯特·蒂格斯特终身成就奖

的临床医学、组织大规模试验项目及基础研究方面具有罕见的才能。她堪称真正的防控高血压的“斗士”。

牵线

刘力生在心血管和高血压领域可谓独树一帜，与其他人不太一样，关键在于她站得很高，视野更为开阔。作为一名临床医师，她同时也特别重视实验室。但实验室很烧钱，等待基础

研究能够转化为经济效益还早得很。

20 世纪 90 年代后，来自德国的分子生物学家 Ganten 教授给了刘力生很大启示，他说，一名临床医师要想搞科研比较难，因为很少有大把的时间用到实验室做实验，但是在分子生物学领域最容易与临床结合，因为标本就来自于患者。

当时 Ganten 教授有想要建立中德联合实验室的想法，因为当时国际上很多人都认为在高血压领域，仅仅停留在实验室或临床是不够的，必须将实验和临床结合，并且要下放到基层。

最终，在刘力生的牵线搭桥下，Ganten 教授与阜外医院达成合作，目的就是要将实验室与临床结合起来，阜外医院为此专门腾出了一整个楼层作为

中德联合实验室。

传承

在刘力生看来，阜外医院从解放军胸科医院时期开始，就不是一家只关注临床的普通医院。吴英恺院士从建立胸科医院起，除了关注临床本身，还带来了搞生理的张琪、搞生化的张英珊、搞细菌的王凤连等，在吴英恺院士设计的构架下，这不是一所简单的医院，更是一家研究机构，这与北京协和医院一脉相承。

但精神的传承有时也受到外在环境的制约。在阜外医院建院初期，医院的发展不用太为钱的事而发愁，大家似乎都是在一门心思地做研究、做事情，专家也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专家，培养人才甚至不计回报。

刘力生说：“但现在环境已经不是那样了，像阜外这样的医院或研究机构，每年关心的也都是流水多少、财务报表等，在运转上与企业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了。因此，在精神的传承上也就相对弱了一些。这不是阜外的个别现象。”

刘力生认为，对于年轻人而言，更多活在当下。对于阜外所承载的历史、成长的历程并不是很了解。这恰恰是年轻人及年轻的领导者所需要的。

整理 / 张雨